

doi: 10.3969/j.issn.1671-9247.2023.02.006

明统治阶层的长城观及其实践

崔健健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面对蒙古诸族始终虎视眈眈和中后期以来女真部落频繁叩关的边防压迫, 明朝统治阶层的长城观基本趋于一致, 即肯定修筑长城的边备思想, 肯定长城对敌骑有效的限制和阻击作用, 广筑城墙, 以加强边防守备, 即使出现些许不同的呼声, 最终也统一于严防“胡虏”的边备政策。在具体实践中, 明统治者因地制宜、修筑起延绵万里的长城, 与九边重镇在地理空间和军事防御功能上形成依托和补充之势, 成为两千余年来中原王朝应对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危机的创举和科学经验。

关键词: 明代; 统治阶层; 长城观; 实践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247(2023)02-0033-06

The Great Wall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the Ruling Class in Ming Dynasty

CUI Jianjia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Gansu, China)

Abstract: In the face of the border defense oppression by the Mongols who were always eyeing covetously and the Nuzhen tribes who frequently led off an attack since the middle and later periods, the ruling class of the Ming Dynasty basically had a consistent view of the Great Wall, that is, affirming the idea of building the Great Wall, affirming the effective restriction and blocking effect of the Great Wall on the enemy, and building walls widely to strengthen the border defense, even if there were some different voices. Finally, it is also unified in the side policy of strict prevention of “Hu Rupp”. In practice, the Ming rulers adapted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built the Great Wall that stretched for thousands of miles, forming a trend of supporting and supplementing the geographical space and military defense functions of the nine major military towns, which became the pioneering work and scientific experience of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y in coping with the crisis of the northern nomads moving south for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Key words: Ming dynasty; the ruling class; The Great Wall concept; practice

长城作为世界历史上修建时间最长、修筑规模最大的军事防御工事, 除了其客观的修筑史、防御史之外, 另有一条主观的同样源远流长的认知线索——观念史^[1]。既往研究中, 已有一批学者致力于“长城观念史”的解读, 如赵现海《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关于长城形象的演变、记述与研究——一项“长城文化史”的考察》通过考察“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世界的长城观, 发现其“关于长城的知识谱系与观念变迁, 根源于国际政局变迁与文化思潮变化”^[2], 并影响了国人对于长城的认知与评价。金国平、吴志良《伊比利亚文献对长城早期记载一瞥》梳理和分析早期伊比利亚文献关于长城的记载后, 认为其对后世了解基督教文化对于长城的评价具有决定性意义^[3]。曾雯雯《唐前期统治者对游牧民族开明民族政策的体现研究》以长城观为重要切入点, 探讨了唐前期统治者对游牧民族与汉民族之间关系的态度和行为表现^[4]。秦汉以来, 统治阶层就修筑长城的功过是非, 展开了长期辩论, 出于自身的立场和时代背景, 逐渐形成充分肯定、完全否定、辩证看待的较为矛盾的长城观。入明后, 面对北方始终虎视眈眈的蒙古诸族和中后期频繁侵犯东北边关的女真部落, 统治阶层内部的长城观基本趋于一致, 即肯定修筑长城的边备思想, 肯定长城对敌骑有效的限制和阻击作用, 因地制宜、广筑城墙, 以加强边防守备, 即使偶尔出现些许不同的呼声, 最终也统一于严防“胡虏”

的边备政策。基于此, 本文拟以长城观为出发点, 对北部边疆危机下明统治阶层的长城观及具体实践进行探析。

一、明以前关于修筑长城之功过的讨论

长城是历史的产物, 也是当时国家意志的集中反映^[5]; 其修建与否、修筑规模的大与小, 在中原王朝构建边疆和民族统治秩序的政治实践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阿瑟·沃尔德隆在《长城: 从历史到神话》一书中所写道: “中国的长城是政策决定的产物, 因此, 研究长城遗址可能是一种外交政策考古学。那些用泥土和石块建造起来的防御工事遗址提供了一种记录, 那里记录着那个王朝军事力量的变化、战略思想的变化, 甚至宫廷政治的变化。”^[6]^[7]

长城的修筑工程, 是中国古代军事政策和民族政策的重要一环。统治者修筑长城的初衷, 都是为了维持国家的统一和北部边疆的长期稳定, 保障边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但大兴长城之役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对民力造成极大的压榨和破坏, 甚至足以引发社会动荡, 影响一个王朝的衰亡。明以前, 统治阶层就修筑长城的功过是非, 以各自坚持的立场和时代背景为出发点, 展开了无数次争论, 并逐渐形成了不同的长城观: 其一, 从国防政策出发, 肯定和赞扬了长城的边防保障功能; 其二, 以民本思想为根基, 否定甚至控诉因修筑长城而劳役民力的情形; 其三, 既肯定长城的军事防御功能, 也不否认修筑长城劳民伤财的严重

收稿日期: 2022-08-28

作者简介: 崔健健(1994—), 男, 甘肃定西人,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后果,即用辩证的思维看待长城问题,以权衡各方利弊。典型的如唐初统治者在隋长城强大的军事功能的基础上,以开放的民族政策取代修筑新长城的方法,从而维护了民族的团结和边疆的稳定。

长城是中国农牧经济和游牧经济之间人为形成的一条重要分界线,强大的军事防御功能毋庸置疑;特别是在冷兵器时代,其对于防范敌骑的入侵,往往起到决定性的战略效果。春秋战国以来,燕、赵、秦三国“边于匈奴”,迫于“百戎散居,各有君长”的边防压力,秦于陇西、北地、上郡,燕自造阳至襄平,“筑长城以拒胡”,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北破林胡、楼烦,亦筑长城^[7]。后秦王嬴政翦灭六国,兼并天下,自称“始皇”,遂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众狄,筑长城以界之”^[8]。至此,“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绵延不绝的长城成为以后的大多数中原王朝所默认的“别内外、异殊俗”的重要分界线。如西汉宣帝、元帝“哀怜”呼韩邪单于,“从长城以北匈奴有之”^{[9]3810};《三国志·东夷列传》写道:“夫余,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10]五胡乱华以来,南北对立,战乱纷争不断,政权更替频繁。鉴于此,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等政权先后主持了长城的修筑工程,至隋朝一度达到高峰。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沙钵略可汗与高宝宁攻陷临渝镇,联合北夷诸部共谋南侵,“文帝新立,由是大惧,修长城,发兵屯北境”^{[11]817},开隋朝修长城之先声。至炀帝,大起长城之役,“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11]450},为当时以及唐初抵御突厥民族的入侵提供了有力的边防保障,也基本奠定了明长城即今日所见万里长城的建筑基础。

长城在冷兵器时代展现出的无与伦比的军事防御功能,也得到了许多军事家、政治家的充分肯定,最为著名的言论当属元康九年(公元299年)江统进呈西晋惠帝的《徙戎论》和太和三年(公元479年)高闾上陈北魏孝文帝的《安边策》。江统认为,夷、蛮、戎、狄四夷之民,既与华夏的语言、货币、历法、礼仪、社会风俗等难以共通,其生性也贪婪狡黠、凶悍不仁,“弱则畏服,强则侵叛,虽有贤圣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导,而以恩德柔怀也”^{[12]1529}。及周室式微,纲纪沦丧,诸侯相互征伐而疏于固守封疆。四夷趁机而起,故有“申缙之祸,颠覆宗周,襄公要秦,遽兴姜戎。当春秋时,义渠、大荔居秦晋之域,陆浑、阴戎处伊洛之间,郟瞞之属害及济东,侵入齐宋,陵虐邢卫,南夷与北狄交侵”^{[12]1530}。于是齐伐山戎、楚吞蛮氏、晋翦陆浑、赵破林胡、秦灭义渠,使中原地区免受异族的统治。至秦兼并六国,秦始皇“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岭长城,戎卒亿计。虽师役烦殷,寇贼横暴,然一世之功,戎虏奔却,当时中国无复四夷也”^{[12]1530}。高闾在《安边策》中建议孝文帝“于六镇之北筑长城,以御北虏,虽有暂劳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即于要害,往往开门,造小城于其侧,因施却敌,多置弓弩”^{[13]1201}。他认为昔日南仲筑城于朔方,赵武灵王、秦始皇、汉武帝相继大兴长城之役,四人皆帝王雄杰,“非智术之不长,兵众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13]1201};并条陈了修筑长城的五大利益:“罢游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无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待劳,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无时之备,其利四也;岁常游运,永得不匮,其利五也。”^{[13]1202}

同时,长城作为古代历史上最为雄伟壮阔的建筑防御工事,不仅是先圣前贤智慧的结晶,更是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底层劳动者风餐露宿、开山凿石,用汗水和血泪筑造的丰碑。这也引发了统治阶层对于修筑长城与民本思想甚至王朝衰亡之间关系的深刻反思。秦末汉初,秦始皇大兴民役所修筑的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成为其暴虐天下、穷困万民的代名词,否定长城的呼声迎来了第一个高潮。陈胜在蕲县大泽乡起义后,攻入陈地,自立为王;张耳、陈余请纓自白马津渡河,至赵地游说诸豪杰:“秦为乱政虐刑,残灭天下,北为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重以苛法,使天下父子不相聊。”^{[9]1831}汉初,伍被答淮南王刘安:秦始皇“遣蒙恬筑长城,东西数千里,暴兵露师,常数十万,死者不可胜数,僵尸满野,流血千里”,于是“百姓力屈,欲为乱者十室而五”^{[9]2171}。贾山《至言》亦云:“秦政力并万国,富有天下,破六国以为郡县,筑长城以为关塞。……然而兵破于陈涉,地夺于刘氏者,何也?秦王贪狼暴虐,残贼天下,穷困万民,以适其欲也。”^{[9]2331-2332}汉晋以来,高堂隆、严尤、杨终等都对“秦筑长城,功役繁兴”的“暴政”表达了明确的否定态度,认为秦很大程度上亡于苛繁的长城之役所直接导致的民力衰竭。隋末唐初,隋炀帝因大兴长城之役而劳百万丁的“暴行”,再次成为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否定长城的呼声迎来了第二个高潮。最典型的如李密所列隋炀帝“十大罪”,第六条即是“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夷不乱华,在德非险。长城之役,战国所为,乃是狙诈之风,非关稽古之法。而追踪秦代,板筑更兴,袭其基墟,延袤万里,尸骸蔽野,血流成河,积怨满于山川,号哭动于天地。”^{[14]2214}秦、隋两朝大修长城以致民力衰竭、民众怨声载道,最终危及自身统治的前车之鉴,也成为唐代以及后面的宋元统治阶层弃修长城的重要原因。

唐初统治者从民生思想出发,并以秦、隋两代大兴长城之役而使王朝统治走向衰亡为借鉴,最终弃修长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彻底否定长城的军事防御功能,而是以隋长城为基本边防保障,继续发挥着长城对突厥以及其他北方游牧民族的巨大阻击作用。如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二月,唐高祖“令州县治堡同以备胡”^{[15]11633};七年六月,“遣边州修堡城,警烽候以备胡”^{[15]11635};九年正月,“突厥声言入寇,敕州县修城堡,谨烽候”^{[15]11635}。玄武门事变后不久,继承大统的唐太宗亦下诏曰:“自隋氏季年,中夏丧乱,黑黎凋尽,州城空虚。突厥因之,侵犯疆场,乘间幸衅,深入长驱,寇暴滋甚,莫能御制。皇运以来,东西征伐,兵车屡出,未遑北讨,遂令胡马再入,至于泾渭,蹂践禾稼,骇惧居民,丧失既多,亏废生业,朕分命师旅,挫其锋锐,频获名王,每夷渠帅。然而凶狡不息,驱侵未已,御以长算,利在修边。其北道诸州所置城寨,粗已周遍,未能备悉。今约以和通,虽云疲寇,然蕃情难测,更事修葺。”^{[15]11636-11637}此外,唐帝国控制的疆域范围已深入北方草原,远远超出了长城的界限,南北初步形成的统合局面也使长城丧失了修筑的必要性^[16]。此种背景下,唐代统治者更愿意通过选拔优秀将领、开放民族政策等来应对北方边疆危机。如唐太宗常谓侍臣曰:“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世勣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14]2486};又以古代王朝控御

四夷之道，“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也”，其“以武功定四海，以文德绥万物，至道所感，格于天地，斯盖二仪降福，以祚圣人”，而使“四夷归伏，无为而治”，方得上策^[17]。宋、元统治者承其绪，放弃了秦、汉、晋、北朝、隋等过分依赖长城来维持边疆稳定的做法，也转向构建开放、包容、并存的民族关系，长城的修筑工程一度搁置。

二、北部边疆危机下明统治阶层的长城观

元明易代后，蒙古诸部虽然退守漠北草原，却依旧保存着极强的军事实力，面对明朝的进攻，他们利用自身擅长的骑兵作战和漠北特殊的地理环境，负隅顽抗，长期与明军周旋。很大一部分蒙古贵族也虎视眈眈，希冀着卷土重来，屡屡入侵明朝的北部边关。有明一代，关于蒙古诸部叩关的记载不胜枚举。土木之变、庚戌之变中，蒙古骑兵甚至长驱直入畿辅、兵临帝都北京，险些酿成毁邦灭国的惨祸。明统治者也一直在为“肃清沙漠”、征服全蒙而努力。雄心壮志的明太祖、明成祖为使其彻底臣服，多次实施铁血手段，发动征服战争，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明蒙争端。仁宣时期，明军大张旗鼓进攻蒙古草原的军事行动已经停歇，统治者也已很少积极寻求解决明蒙问题的对策。土木之变后，双方攻守彻底易势，蒙古骑兵开始频繁、大胆、直接地侵扰明朝北部疆域，动辄进入宣府、大同和陕西、甘肃一线，造成明蒙关系的紧张化，直到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俺答封贡”后才有所缓和^[18]。然“俺答封贡”虽有效缓解了蒙古对帝都北京的直接威胁，但并没有解决明蒙关系中的固有矛盾^[19]，如土蛮等势力依旧不断侵扰着辽东地区。可以说，终明一代，明蒙双方未能达成真正的和平，蒙古诸部始终是明朝北部疆域直面的巨大威胁。

复次，国初明太祖即着手于对北方草原的第二大游牧民族——女真展开招抚工作。自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设定辽都卫指挥使司，元朝旧将纳哈初、鲸海千户速哥帖木儿、木答哈千户完者帖木儿、牙兰千户皂化等，陆续率部归服。至永乐朝，各部归服者日众，明成祖初步制定对其的统治总纲：设立羁縻卫所，以女真各部首领担任长官，由明廷统一发放印信，任其“自相统属，各安生聚”^[20]，“共享太平之福”。仁宣两宗在继承前朝羁縻政策的基础上，又因时做了适当调整，进一步强化了双方的贡市贸易^[21]。土木之变是改变明与女真之间根本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该事件后，明朝军力迅速由盛转衰，逐渐失去对周边民族进行武力征伐的战略优势，转向以守备和防御为主。女真诸部却因受内部断断续续的兼并战争洗礼，不断提升着军事实力，且呈现出统一的趋势。崛起的海西、建州女真等明目挑衅，屡次侵犯明朝的东北边关，史不绝书；至成化间，甚至一年入寇多达97次，杀害10余万人^[22]。明廷虽有以“成化之役”为代表，动用雷霆手段剿灭建州女真势力的军事行动，但已无法阻遏女真诸部对王朝东北边疆的侵犯、渗透和蚕食。女真成为明朝北部边防的最大隐患，直至女真建立的清政权最终取代明朝在全国的统治地位。

显然，明统治阶层所面临的严峻的边疆问题，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其一，明朝北部边疆直面的蒙古部族，有着在全国建立统治的经验，并拥有将近一个世纪的统治历史，且他们退守漠北草原的过程中，依旧保留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其中很大一部分贵族甚至希冀着

卷土重来、再次入主中原，故而频繁入侵王朝的北部疆域，甚至冲入内地，直逼帝都北京。其二，明中叶以来，女真诸部迅速崛起，屡屡叩关扰民，挑衅被蒙古势力严重削弱的明军，并隐约和蒙古形成联合之势，成为王朝东北疆域的最大隐患。如此，明朝东起辽东、西至甘肃，绵延万里的北部边防线上都受到来自游牧民族的侵扰。面对蒙古、女真频繁犯边且又灵活难治的边防困境，古代军事史上对游牧民族的骑兵进攻起到过巨大战略防御功能的长城，重新进入统治阶层的视野。而不同于秦汉以来，统治阶层以自身的立场和时代背景出发，或充分肯定，或完全否定，或辩证看待的较为矛盾的长城观，明统治阶层的长城观基本趋于一致，即肯定修筑长城的边备思想，肯定长城限阻敌骑的军事防御功能，因地制宜、广筑城墙，以加强边防守备。即使统治阶层内部偶尔也会发出些许关于修筑长城的不同呼声，如冯梦龙以“杨广西筑长城，东征辽海，使天下男冤女旷，父寡子孤”^[23]，但最终还是统一于国家严防“胡虏”的边备政策。

一方面，明成祖迁都北京，既“有利于抗击从北边袭来的蒙古人的威胁，又能进一步控制北方地区，对于巩固边防以及维护全国统一都有积极意义”^[24]。但也使得明朝的权力中枢和统治中心彻底北移，开始直面北方虎视眈眈的蒙古和其他游牧民族，边防守备稍有不慎，便有可能造成游牧民族铁骑兵临畿辅的被动局面。这种强烈的边防压迫感，促使明统治阶层开始反思秦末汉初以来历朝历代较为矛盾的长城观，特别是因为一味否定修筑长城劳役大量民力，而漠视其巨大军事防御功能的长城观。如于慎行《谷山笔麈》提出，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和隋炀帝开通京杭大运河之举，“为其国促数年之祚，而为后世开万世之利，可谓不仁而有功者矣”^[25]。朗瑛《七修类稿》亦有类似看法：“始皇之于长城，隋炀之于漕河，又人虽不善，而事乃万世之利，尤为大异者也，此善恶不嫌同科”^[26]^[562]；又有感于“长城襄邓”的故事，叹曰：“秦皇筑长城，起自临洮，至于辽东，延袤万余里，暴师于外十余年而后成焉，至今赖之，后人未尝有感始皇者。”^[26]^[67]谢肇淛《五杂俎》认为，秦始皇大兴长城之役，虽然加快了秦朝灭亡的步伐，然西北诸边，广袤无垠，无长城一日不宁、无长城一日不能守；又以近时戚继光主持修筑的蓟镇长城，固不可攻，“虏（女真）至其下，辄引去，其有功于边陲若此，而犹不免求全之毁，何怪书生摛纸上之谈而轻诋嬴政也！”^[27]程登吉还将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的历史功绩作为生活必备常识，录入其所撰儿童启蒙读物《幼学琼林》一书：“秦政防胡，特筑万里长城。”^[28]可见，他们普遍肯定了春秋战国以来“筑长城以御四夷”的边备思想，对秦始皇大修长城的历史功绩，也给予了相对正面、中肯的评价。

另一方面，明统治阶层肯定修筑长城的边备思想的同时，也普遍认同长城对敌骑有效的限制和阻击作用。“明朝的城墙建筑并非任何人的首选，它只是在其他提议被否决后才被采用的。”^[6]^[221]建国之初，明太祖在对逃遁漠北的蒙古残余势力实施军事打击时，也在积极构建边防军事体系，从最初的卫所镇守，至都卫体制、都司卫所、大将镇守，再演变为塞王守边。其间，徐达“守御永平、山海等处，筑御贼长城三十余里”^[29]；宋讷提出屯兵与屯田相结合的“谨备边之策”^[30]等，都是统治阶层完善边防军事体系的重要尝试。后经永

乐、洪熙、宣德三朝的营建,北部疆域的九边防御体系也已初具雏形。面对明朝“严阵以待”的态势,经明成祖数次征伐后逐渐恢复军事实力的鞑靼、瓦剌骑兵,依旧频繁扰边,而边疆将士无险可据、顾此失彼、疲于应付的现状,尤显得明朝边防军事体系捉襟见肘。此种情形下,长城重新进入统治阶层的视野;特别是土木之变后英宗被俘,瓦剌部陈兵九门,更坚定了统治阶层大修长城、以有效限制和阻击敌骑的决心。如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兵部尚书王复进言:“今天下一统,诸种番夷虽或出没,不足深虑,惟北虏动辄长驱深入,最为边患。辽东、宣府、大同、宁夏、甘肃皆有高山大川、长城固垒阻隔,延绥境外亦有黄河千六百余里,实天造地设之险。”^[31]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户部尚书余子俊总督大同、宣府军务,鉴于土木事变中瓦剌大军长驱直入宣府、大同之地的惨痛教训,上疏“请以延绥边墙法行之两镇”,曰:“东起四海冶,西抵黄河,延袤千三百余里,旧有墩百七十,应增筑四百四十,墩高广皆三丈,计役夫八万六千,数月可成。”^{[32]4738}而明统治阶层长城观渐趋一致,且开始付诸实践,是正统以来九边重镇沿线大修长城的先声。

三、明统治阶层长城观的具体实践

有明一代,自明太祖以“建立军事卫所屯兵戍守为主,辅以宗王守边”^[33]为指导思想,着手构建北部边疆的军事防御体系,至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军攻破帝都北京、结束朱明王朝在全国的核心统治,统治阶层面对“胡虏”频繁叩关的北部边疆危机,长期对九边重镇沿线的长城防御体系进行着积极的、有针对性的调整与改进,最终在隋长城的基础上,修筑起东起鸭绿江、西迄嘉峪关,蜿蜒六千余公里的明长城。

九边即以“镇”为单位的大区域交错结合“镇”内小区域而形成的军事战略要地^[34],是明朝防御北部边疆的前沿阵地。《明史·兵志》载:“元人北归,屡谋复兴。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32]2235}其中,因地制宜、修筑延绵不绝的长城,与九边重镇在地理空间和军事防御功能上形成依托和补充之势,是明王朝成功守御北部边疆的重中之重,也是明统治阶层应对两千余年来北方游牧民族频繁南下危机的创举和科学经验。

辽东镇沿线长城主要利用辽河天堑,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修筑工程。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王翱提督辽东军务,“起山海关抵开原,缮城垣,浚沟堑。五里为堡,十里为屯,使烽燧相接”^{[32]4700},一举奠定辽河西线长城的基础。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辽东副总兵韩斌鉴于建州女真频繁“寇边”,“自抚顺而南四十里设东州堡,东州之南三十里设马根单堡,马根之南九十里设清河堡,清河之南七十里设讷场堡,讷场之南一百二十里,设暖阳堡,烽堠相望,远近应援拓地千里焉。”^{[35]340}分守开原的参将周俊则主持修筑了开原镇北关至抚顺的长城,“开拓柴河抵蒲河界六十余里,改镇化、清阳二堡,柴河堡增立烽堠”^{[35]317}。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巡抚都御史李承勋以“墙堡墩台圯殆尽,将士依城堑自守,城外数百里悉为诸部射猎地”,主持了第三次修筑工程:“身负畚鍤先士卒,凡为城堑各九万一千四百余丈,墩堡百八十有一,招逋逃三千二

百人,开屯田千五百顷。又城中固、铁岭,断阴山、辽河之交,城薄河、抚顺,扼要冲,边防甚固”^{[32]5264}。至此,辽东长城的修筑工程完成,因修筑者意欲充分利用辽河的地理优势,不得已将辽河大部分河套地区隔离在长城以外,使得这段长城的走向呈现为“凹”字型。

蓟州成为明朝北部边疆的防御重镇,并在沿线大规模修筑长城,始于“庚戌之变”。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俺答汗攻破古北口、跨越“内边”,兵临北京城下,震惊朝野。过后,明统治阶层东起山海关、西至黄花镇的漫长防线上增设卫和守御所、布置关寨营堡,着力进行了加固边墙、修筑墩台的工程。首先,俺答退兵后,兵部侍郎王邦瑞主持了疏浚“九门濠堑”的工程,又极力否定了咸宁侯仇鸾“罢筑蓟镇边垣”的上疏^{[32]5270-5271}。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兵部议准:“居庸里口如横岭、镇边、大石岭、唐儿巷等处,或原无边墙,或有墙不固者,皆令修筑防守。”^{[36]1837}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戚继光镇守蓟州,见“蓟镇边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则百坚皆瑕,比来岁修岁圯,徒费无益”,遂议建敌台,“台高五丈,虚中为三层,台宿百人,铠仗粮具备”;至1200座敌台筑成,“精坚雄壮,二千里声势联接”^{[32]5614-5615}。同年,明廷将蓟州、昌平分为12路,“边墙稍加厚,二面皆设垛口,七八十垛间,下穿小门。曲突而上,其缓者计百步、冲者五十步或三十步,即筑一墩台,视边墙高一倍,广十二丈,内容五十人,共筑一千五百座,令边军哨守”^{[36]1837}。万历元年至四年(公元1573—1576年),明神宗下令陆续在滦河以东、居庸关以西及松棚诸路增筑墩台200余座;蓟、昌二镇修筑边墙90余里、添修墩台500余座,并在曹家寨将军台一带“跨山横筑内城,守以七台”^{[36]1837}。蓟镇成为明朝北方防御区的重心,“春秋防守,视他边特严”。

宣府、大同两镇沿线长城的修筑,是明统治阶层对瞬息万变的明蒙关系而积极应对、调整的缩影。宣大边防线延袤1300余里,“两镇咽喉”独石口又“正当敌冲”^[37],故长城修筑工程起步较早。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兵科给事中朱纯“请修塞垣”,宣府总兵谭广认为“自龙门至独石及黑峪口五百五十余里,工作甚难,不若益墩台瞭守”,英宗遂下令增修赤城、后城、镇安等堡烟墩22座^{[32]2237}。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刑部尚书魏源受帝命“整飭大同、宣府诸边”,次年“增修开平、龙门城,自独石抵宣府,增置墩堠”^{[32]4357}。嘉靖年间,以毛伯温、翁万达主持修筑长城为代表,使宣大长城线得以完美连接,并逐渐延伸至太原一带,从而奠定了两镇的长城规模。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右副都御史张文锦巡抚大同,“以拒贼得重名遂锐意振刷”,于大同城北90里外增设水口、宣宁、只河、柳沟、桦沟五堡,但因“参将贾鉴督役严”,“徙镇卒二千五百家戍之”的计划告废^{[32]5287}。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毛伯温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重新营建大同所辖镇边、镇川、弘赐、镇河、镇虏五堡,并“募军三千防守,给以闲田,永除其赋,边防赖焉”^{[32]5240}。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翁万达根据边防形势,数次上疏“议筑边墙”,兵部虽以“大同旧有二边,不当复于边内筑墙”为由屡屡阻挠,世宗仍拨发帑银29万两,令其增筑边墙,“自大同东路天城、阳和、开山口诸处为墙百二十八里,堡七,墩台百五十四;宣府西路西阳河、洗马林、张家口诸处为墙六

十四里，敌台十；斩崖削坡五十里”^{[32]5245}。后翁万达会同宣府、大同、山西镇巡官员再次上陈“边防修守十事”，世宗应允，拨发帑银60万两，“修大同西路、宣府东路边墙，凡八百里”^{[32]5246}。其中，大同巡抚詹荣“筑东路边墙百三十八里，堡七，墩台百五十四”^{[32]5289}；总兵周尚文“筑阳和以西至山西丫角山，凡四百余里，敌台千余”^{[32]5582}，正式连接了大同与太原的长城工事。隆庆以来，明蒙互市被提上日程，并最终成为现实，边防形势缓和，宣大沿线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历史宣告结束，但修缮旧有边墙、要冲处修建墩台、疏浚壕沟等工程却始终都在进行。

偏头镇也称山西镇、太原镇，核心防御地带为偏头、宁武、雁门三关，“外接宣大，为畿辅屏蔽”^[38]。土木事变后，瓦剌骑兵深入宣府、大同为患，三关因与之互为“唇齿”，边防日渐受到重视。嘉靖中，俺答汗屡寇太原，“深入数百里”，烧杀抢掠；明廷“始改副总兵为总兵镇守，治偏关，寻移治宁武”，视为边镇，筑堡固墙^{[36]1849}。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翟鹏总督山西军务，“巡抚以下并听节制”，为了抵御俺答骑兵的侵袭，组织军民“浚壕筑垣，修边墙三百九十余里，增新墩二百九十二、护墩堡一十四”^{[32]5382}。嘉靖二十六年（1547），右副都御史孙继鲁巡抚山西，对翁万达“撤山西内边兵，并力守大同外边”的上疏提出异议，认为“偏头、宁武、雁门东抵平刑关为山西长边，自右卫双沟墩至东阳河、镇口台，为大同长边，自丫角山至双沟百四十里，为大同紧边，自丫角山至老牛湾百四十里，为山西紧边。论长边则大同为急，山西差缓，论紧边则均为最急。此皆密迩河套，譬之门闾，山西守左，大同守右，山西并力守左尚不能支，又安能分力以守大同之右，近年寇不敢犯山西内郡者，以三关备严故也。”^{[32]5385}但并未被世宗采纳，这也从侧面看出世宗重宣大防卫而轻山西三关的态度。直至“庚戌之变”后，世宗才于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下令“老边墙下再添筑堡四座”。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随着明廷题准“山西三关惟偏老沿边地方，自蕨菜茆起，至老牛湾止，边长一百一里有零，添设砖包空心楼一十五座、实心楼一十五座、土筑敌台二百一十六座，仍通修边墙，务高坚如法”^{[36]1849}，偏头镇沿线的长城修筑基本完工。

延绥成为边防重镇，是蒙古部落屯聚河套，屡次侵犯延庆、府谷、神木、龙州、榆林诸城县的结果。正统间，镇守都督王祯“始筑榆林城，建缘边营堡二十四，岁调延安、绥德、庆阳三卫军分戍”；天顺中，蒙古阿罗驻牧河套，频繁内犯，余子俊徙治榆林，“联墩勾堡，横截河套之口”，遂称“雄镇”^{[32]2237-2238}。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工部尚书王复自延绥抵甘肃，有感于延绥边患渐起，建言曰：“自安边营接庆阳，自定边营接环州，每二十里筑墩台一，计凡三十有四。随形势为沟墙，庶息响相闻，易于守御”^{[32]4717}，为宪宗采纳。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余子俊巡抚延绥，次年上疏条陈修筑边墙之利，获得宪宗支持，延绥长城之役兴起，“东起清水营，西抵花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凿崖筑墙，掘堑其下，连比不绝。每二三里置敌台崖砦备巡警。又于崖砦空处筑短墙，横一斜二如箕状，以瞭敌避射。凡筑城堡十一，边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砦八百十九，役军四万人，不三月而成”^{[32]4737}。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陕西巡抚杨一清以“寇不入套二十余年”皆徐廷璋、余子俊修筑边墙之功，上疏建言：“延绥安

边营石涝池至横城三百里，宜设墩台九百座，暖谯九百间，守军四千五百人；石涝池至定边营百六十三里，平衍宜墙者百三十一里，险崖峻阜可铲削者三十二里，宜为墩台。”武宗发放帑金数十万，命杨一清主持修筑延绥边墙，却因刘瑾诬陷其“冒破边费”而作罢，“其成者，在要害间仅四十里”^{[32]5226}。

嘉靖以来，俺答汗为促成明蒙互市贸易，时常攻掠明朝北部边境，甚至数次深入畿辅，威胁帝都。在积极应对俺答汗危机的背景下，延绥镇沿线的长城修筑工程也如火如荼地施展开来：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明廷以延绥逼邻套虏，“添定远、宁塞二堡，修筑边墙”；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在榆林西北的古梁、易马，镇城硬地梁、柳河梁等地增修城堡，“以严防护”；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命及时修筑延庆地区的东西通道和榆林自石峡墩至长乐地界一带、镇城东西北三面的外逻城垣；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下令修筑东起皇甫川及镇城，西至常乐的20余里边墙^{[36]1851}。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明廷与俺答汗达成“封贡”协议，延绥也陆续开通了蒙汉互市的市，但修筑长城的工程并未停歇。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明廷下令继续增筑延绥墩院，“又于十里之间，酌量缓急，以为寨城”；次年又令榆林、神木、定边、靖边四道“筑空心敌台”^{[36]1852}。

宁夏发展成为西北边疆的防御重镇，亦与蒙古部族驻牧河套密切相关。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军克宁夏，置宁夏府；五年（公元1372年）废府，陆续设置宁夏卫和宁夏前卫、左屯卫、右屯卫、中屯卫。成化前，宁夏边患较少，及蒙古部族相继驻牧河套地区，“河东三百里皆设备，递年修治墙堑”，统治者在宁夏镇沿线大规模修筑长城，亦始于此。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宁夏总兵官史昭进言：“所辖屯堡，俱在河外，自河迤东至察罕脑儿，抵绥德州，沙漠旷远，并无守备，请于花马池筑哨马营。”^{[32]2237}英宗应允。成化十五年（公元1479年），经明廷题准，宁夏镇守总兵、巡抚等按“军三民七”的比例兴长城役，修建宁夏东路沿河一带边墙190余里，筑砌西路柴草等地旧墙60余里^{[36]1852}。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在宁夏中卫与庄浪交界之处，即窑洞儿水头与架子山尾石峡口连接地带，修筑土墙、山崖关墙和水洞^{[36]1852}。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在宁夏花马池与延绥定边营相连接处，挖掘壕堑60余里，以防护盐池；在花马池西至横城堡，另挖掘新壕堑166里；并在东南起定边营大山口，西北至宁夏黄河的中间平原地带，“空沟筑垒，使虏不得长驱”。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在镇远关与黑山营之间的险要地方“改筑墩台，拨军守哨”。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在沿“花马池——安定诸堡——横城”200余里边防线上，添筑敌台263座^{[36]1852}。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修筑镇城及平虏城以北边墙2000余丈；于中卫旧胜金关地基上兴修关隘、建堡筑墩，设置监市官驻扎的“公馆”^{[36]1852-1853}。

甘肃是明朝西北边疆“西遮西域，南蔽羌戎，北捍胡虏”的咽喉之地，有“孤悬重镇”之称。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冯胜、傅友德攻克甘州、肃州后，在肃州以西70余里，南据祁连山、北依黑山的要冲修筑嘉峪关，以为甘肃镇边界；明太祖、明成祖又陆续在嘉峪关以西设置安定、阿端、曲先、罕东、沙州、赤斤蒙古、哈密七卫，作为甘肃镇的屏障。明中叶以来，蒙古瓦剌、

吐鲁番等先后与明王朝争夺哈密地区,甘肃镇沿线的边防线紧张起来,修筑长城的工程也随之展开。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右佥都御史杨博巡抚甘肃,其“大兴屯利,请募民垦田,永不征租”的同时,又主持修筑了“肃州榆树泉及甘州平川境外大芦泉诸处墩台,凿龙首诸渠”^{[32]5656}。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在西南寺与卫边南山添筑墩台,“红城子关设水门,平川北改筑边墙”。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在“古浪山后筑堡一座,募军防御”。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经明廷批准,于山丹一带临边地方又修筑了大量墩台^{[36]1854}。

固原镇不同于其他八镇,完全属于明朝的“内地”。成化间,随着蒙古孛来、火筛诸部相继入驻河套地区,固原镇沿线成为延绥、宁夏两镇以外,首当敌冲的前沿阵地。其东接延绥镇、西临甘肃镇、北部以宁夏镇为外部屏障,往往设立总制府,总领三镇军务,故称“巨镇”。如此,其沿线长城的修筑工程也势在必行。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秦紘起户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制三边军务,见“固原迤北延袤千里,闲田数十万顷,旷野近边,无城堡可依”,上疏建言于花马池以西至小盐池200里,每20里筑1堡,堡周48丈,役军500人;于固原以北诸处修筑屯堡,募人屯种,岁收赋米。孝宗应准,秦紘遂主持“修筑诸边城堡一万四千余所,垣堑六千四百余里,固原屹为重镇”^{[32]4745}。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兵部左侍郎李钺总制陕西三边军务,初至固原,即以“空城计”吓退入犯的蒙古大军,随后“增筑墩堡,谨烽堠,广储蓄,选壮勇为备”^{[32]5256},极大增强了固原镇沿线的边防力量。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经兵部题准:“防秋之日,总督驻花马池,陕西巡抚与总兵官同驻固原。一遇有警,总兵仍赴下马房关截杀。”^{[36]1853}如此,固原镇的防御体系也渐趋完备。

四、余论

明长城的修建时间、修筑规模为历代中原王朝之最;与之相辅相成,日渐完善的明长城体系,也是明朝立国久远、享国祚近三百年的重要基础保障。正如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所言:“它(明朝)四周的防卫非常好,既有由自然也有由科学所提供的防御。它在南方和东方临海,沿岸有很多小岛星罗棋布,使敌舰很难接近大陆。这个国家在北部则有崇山峻岭防御敌意的鞑靼人的侵袭,山与山之间由一条四百零五英里长的巨大的长城连接起来,形成一道攻不破的防线。”^[39]同样,明长城所起到的军事防御功能,也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朝代。“明朝依靠长城成功地遏制了元朝残余的南下,持续巩固了北京作为‘大一统’中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客观上为清朝进一步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40]明清易代后,明朝最终被跨越长城的北方满清政权取代,长城的军事防御价值遭到严重质疑;后续研究中,继续以长城观为切入点,解读清初统治阶层对明长城的认知和评价,应是颇具学术意义的尝试。

参考文献:

[1]赵现海. 异域看长城: 明清时期朝鲜燕行使的长城观念[J]. 史

学月刊, 2017(6): 47-56.

- [2]赵现海. 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关于长城形象的演变、记述与研究: 一项“长城文化史”的考察[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12): 127-136.
- [3]金国平, 吴志良. 伊比利亚文献对长城早期记载一瞥[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2): 65-69.
- [4]曾雯雯. 唐前期统治者对游牧民族开明民族政策的体现研究[J]. 兰台世界, 2018(4): 119-122.
- [5]李大伟. “华夷之辨”与“守中治边”: 论明长城修建的内在驱动力与实际作用[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4): 158-163.
- [6]阿瑟·沃尔德隆. 长城: 从历史到神话[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8.
- [7]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2885.
- [8]范曄.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2876.
- [9]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10]陈寿. 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841.
- [11]李延寿. 北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2]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3]魏收. 魏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4]刘昫.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15]王钦若, 等. 册府元龟[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16]穆渭生. 唐代关内道军事地理研究[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120-125.
- [17]王溥. 唐会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5: 1724.
- [18]沙勇. 传统边疆治理理论相关问题的思考: 基于明朝治理北部边疆及其与蒙古关系的反思[J]. 求索, 2014(8): 158-162.
- [19]田澍. 张居正的蒙古观及其实践[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4(2): 77-87.
- [20]历史语言研究所. 明太宗实录[M]. 台北: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1962: 1053.
- [21]叶晓婷. 明宣宗时期女真政策论述[J]. 民族论坛, 2014(3): 86-89.
- [22]严从简. 殊域周咨录[M]. 台北: 台湾华文书局, 1968: 1040.
- [23]冯梦龙. 情史[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0: 370.
- [24]许大龄. 明史[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0: 34.
- [25]于慎行. 谷山笔麈[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131.
- [26]朗瑛. 七修类稿[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 [27]谢肇淛. 五杂俎[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75.
- [28]程登吉. 幼学琼林[M]. 长沙: 岳麓书社, 2020: 251.
- [29]历史语言研究所. 明英宗实录[M]. 台北: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1962: 5530-5531.
- [30]历史语言研究所. 明太祖实录[M]. 台北: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1962: 2594.
- [31]历史语言研究所. 明宪宗实录[M]. 台北: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1962: 799.
- [32]张廷玉. 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33]王文娟, 毕奥南. 明朝长城防御体系考述[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2(4): 29-46.
- [34]刘景纯. 明代前中期九边区域防御形态的演变[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0(4): 47-56.
- [35]刘立强, 刘海洋, 韩钢. 辽东志[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 [36]申时行, 等. 大明会典[M]. 扬州: 广陵书社, 2007.
- [37]杨时宁.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M].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15: 62.
- [38]历史语言研究所. 明世宗实录[M]. 台北: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1962: 5041.
- [39]利玛窦. 利玛窦中国札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9.
- [40]田澍, 马维仁. 明长城资源的多学科整合与长城学的构建[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6): 78-86.

(责任编辑 聂根兰)